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唯物史观基础

陈加飞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国情演变的深刻互动性,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有机统一生命体,不可逆转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创性命题和标识性话语,丰富并创新了“中国国情”的思想内涵与话语表达,具有深厚的唯物史观哲学基础。该命题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前提性要素的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力性规律的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性功能的展现,以及给定性与选择性方法论精髓的吸取,充分彰显了唯物史观的当代生命力。基于唯物史观“前提—动力—结构—方法”的四维阐释,构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命题的唯物史观基础及其叙事逻辑,有利于进一步树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国情观,增进“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和“以中国为方法”的视阈融合,增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自信与实践自觉,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自主话语体系创新的唯物史观智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唯物史观;方法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中的辩证法研究”(2022BKS038)、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个结合’的唯物辩证法意蕴研究”(SCJJ24ND036)。

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哲学基石,对创造和创新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对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范畴创新中国特色自主话语体系,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①这一原创性命题和标识性话语的提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领导地位、领导责任和领导自信的时代体现。从原创性命题维度来看,不同于从地理环境、人口规模、民族文化、历史传统等客体向度构建中国国情的认知体系,“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命题从主体向度揭示了中国国情的动态发展性,丰富了中国国情的思想内涵。从标识性话语维度来看,“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话语,创新了中国共产党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国情本质关联表达的话语体系,以“最大国情”的话语表达凸显了党的领导在国情系统中具有的“最大变量”和“关键要素”功能性地位,对于“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的生成与演化具有前提性基础意义和根本性保障作用。作为实践必然与客观事实,这一原创性命题和标识性话语是我国独特的历史传承、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社会经济,在新的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下长期发展、内生性演化的必然结果和鲜明表现。^②作为理论必然与意识反映,这一重要命题绝不是一种毫无根据、毫无底气的主观臆想,而是我们党坚持和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关键一环和具体体现,是奠基于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和生动实践基础之上的自觉反思,也是正确反映党的领导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和强国建设的理性认识和战略思维,蕴涵深刻

的唯物史观哲学意蕴。

一、前提性要素: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坚持

“社会存在”和“中国国情”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话语表达,具有共同的客观指向性。一定意义上,“社会存在”是“中国国情”的唯物史观哲学话语表达,“中国国情”是“社会存在”的唯物史观中国化话语呈现。在唯物史观哲学话语体系中,“社会存在”话语及其内容规定主要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等三个维度,其中除自然地理环境之外,人口因素和物质生产方式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着内在的本质关联。解析两者在何种意义上同构,是诠释“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唯物史观意蕴的前提和基础。

(一)对“‘现实的人’是历史活动的起点”的坚持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不同于唯心史观从抽象的人出发,唯物史观从“现实的人”即具体的、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出发,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与动力。“人口”在哲学话语表达中指向“人类社会的一切有生命的个人构成的总和”,^④也是中国国情的基本要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由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9900多万党员,是一个在拥有14亿多人口国家长期全面执政的大党,其党员数量占据全部人口的1/14,构成了中国社会存在和中国国情系统中人口因素的关键部分。从“人口”到“党员”的范畴与话语转换,涉及的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切中社会性质与制度属性的本质维度了,其“人口”也“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⑤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现实的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原则,准确把握并激发了不同时期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淬炼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塑造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诠释了“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之路。实

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⑥党的二十大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党关于“人民”“人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揭示了人的因素在社会存在中的前提性意蕴。从这个意义来说,人口因素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国情系统中的第一变量,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情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与前提性意义。

(二)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贯彻

唯物史观所理解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⑦《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⑧在唯物史观看来,政党是连接个体与阶级的中介组织,政党的人民代表性化解了个人与阶级之间的意识冲突。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个人与集体良性互动的交互关系,“使作为偶发性事件的个体实践融入总体性历史进程,迸发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社会力量”,“最大程度发挥主体参与历史、推动历史的积极力量”。^⑨

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核心环节,是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变革与超越的逻辑“阶梯”和核心范畴。唯物史观对中国的改变,“不仅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化,还需要立足中国国情找到‘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把政党组织的主导性转化成群众创造的主体性并实现两者的统一”。^⑩这一历史过程根本地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物质生产方式的不断更新与重塑,“既体现在主动追求生产力平衡和充分的发展,力图驾驭社会化大生产所积累的强大生产力,也体现在生产关系的建构不以资本增值为核心而是以‘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⑪具体而言,生产力方面,把一个旧中国变成一个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通过改革开放创造了“两大奇迹”,以新时代十年变革成就书写了人类生产力发展进程中的中国奇迹;生产关系方面,促进中国国情的根本性

质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党不可战胜的力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党有非常严密的组织。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政党,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关键是教育管理好党员、干部”。^⑫“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⑬作为一个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不仅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前所未有,在世界政党史和政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改变了物质生产方式,才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中国国情的重塑。这在理论上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原理的前提性坚持。

(三)对“社会意识”反作用“社会存在”能动性原理的运用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唯物史观以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倡导“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⑮与此同时,唯物史观也承认和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性。“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⑯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态,中国共产党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形态。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否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试金石。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树立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一开始就带着崇高的使命来到人间,并不断地发展壮大,离开了这个神圣的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没有产生之理”。^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社会意识,不仅体现为立志人类解放、立志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使命自觉,还体现为以坚守“人民至上”为核心的价值旨趣。

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唯物史观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过程,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理论飞跃,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性反映的理论自觉和历史明证。进入新时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既是对中国国情这一“社会存在”的自觉反映,也是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客观认识和实践自觉,充分彰显和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二、动力性规律: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的遵循

按照唯物史观,“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⑱某种意义上,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与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与改变中国国情的历程,也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动力性规律遵循的历程。

(一)政党组织型生产力:党的领导及其作用发挥对“生产力”关于劳动者主体能动性原理的遵循

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从“人”的维度来理解和把握劳动,认为劳动的本质就是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就是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作为社会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并不是孤立的劳动者个体,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体。“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⑲作为组织,只能是阶级社会中的先进阶级,“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⑳作为一种先进阶级的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正是这种“集体力”和“新力量”的组织载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核心价值的根本分野在于无产阶级代表人的利益、代表未来的利益,旨在实现人类的解放,而资产阶级代表资本或物的利益、代表过去的利益,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构成的生产力结构系统,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从生产力三要素之一的劳动者主体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作用发挥塑造了一种政党组织型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作为带领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的组织主体,肩负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使命。党的二十大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存在、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力的发挥就是一种生产力,党组织的党员及其组织方式就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构成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机体中的重要环节,彰显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哲学智慧。

(二)政党组织型生产关系:党的领导凸显的制度性差异对“生产关系”具体原理的遵循

生产关系体现的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交往组成的社会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从生产关系维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凸显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差异。其一,经济关系中,体现为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及其无产阶级政党主张“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共同占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在产品分配上不存在剥削”。在中国,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决定了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确保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激发了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能动性。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政党主张“生产资料归少数剥削者占有,劳动者占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生产资料,并在生产中处于被剥削地位”。^②在具体的经济运行活动中,资本与劳动、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的矛盾主导和建构了一种制度性剥削关系。其二,政治关系中,体现为人民主体与资本主体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相反,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对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政治上要求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在中国,由于党的领导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成功代表劳动力量实现了对资本的驾驭。

其三,组织关系中,体现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根本区别。从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构建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力量,是以支部为原子建立广泛的基层党组织,形成自上而下的严密组织体系,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从上往下贯穿着一个统一的领导制度体系,构建了一个有机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从个人到组织再拓展到全党,都贯穿着党的领导核心力量。西方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运行方式,形成了原子个体主义的制度逻辑,“强调个人权利对社会的绝对优先性,而社会只不过是人的无方向的集合,不具有独立的价值”。^③显然,资本主义的原子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强调的集体主义具有根本的组织性差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架构与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具有根本的制度性差异,体现了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遵循。

(三)政党组织型生产方式:党的领导的核心价值与组织方式对“生产方式”关于改造自然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正义规定性的遵循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开篇就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④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秉持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只有经济的自由和资本增殖,而看不到人的自由发展,出现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世界的非正义化。中国共产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核心价值观,根本区别体现在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分野上,而这一核心价值分野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共产党宣言》早已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

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②由于代表的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不仅在剩余价值的驱使下激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把这一矛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引发帝国主义和全球的生态危机。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在核心价值观和组织方式上的独特性，决定了其领导的意义和使命不仅在于提高生产力，更在于实现生产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致力于科学处理“物”的增长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着力实现全体人民对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成人与世界的一体性共生关系，“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和正义世界。^③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至的本质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④作为代表和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意志和目标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民族性政党，还是一个为世界谋和平、谋大同、谋进步的世界性政党；不仅要处理好中国自身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还积极主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构建出中国式现代性，充分证明了对唯物史观的正义性追求。

“任何事物和对象都处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中，在不同的关系中，便具有不同的规定性”。^⑤从改造自然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组织方式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通过世界视野的国情比较，两种制度的价值对比更能体现中国独有的国情本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何以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特色。百余年社会实践成就的取得，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的实践检验。当下，“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⑥这不仅塑造着中国国情的新样态，也在催生新型生产关系，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新挑战与新要

求，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正在呼唤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与理论创新。

三、结构性功能：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展现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唯心史观主张“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唯物史观主张“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天然的基础”，“才是原动力”，而国家不过是“从这一基础上燃起”的“火炬”而已。这为观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某一国家的基本状况，尤其是国家与社会结构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将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这个最后的、最大的避难所彻底地驱逐出去了，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认识以及判定一个国家的国情依据建立在科学历史观基础之上。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依据符合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原理

“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这是“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⑦唯物史观，特别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观念的理论”，^⑧是科学判断中国国情的理论依据，也是科学认识中国国情的方法论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由中国国情的客观依据以及科学内容符合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所决定的。

经济基础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⑨它包括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经济基础力量的分散化，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采取社会主义的发展定向，整合不同阶级的社会力量。从经济维度来看，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弱小，不占据主要的社会经济成分和形式，加之外国资本主义的重压和剥削，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生长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从政治维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多少都带有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烙印。资产阶级带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不能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中国无产阶级也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条件,锻造了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具备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逐步改变了旧中国经济落后、国民饱受欺凌的被动局面,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历史前提和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带领人民探索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进入新时代,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取得了新时代十年变革的伟大成就,不可逆转地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理论飞跃,也检验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真理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诞生、成长、发展壮大到新时代的大党、强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不断改变与重塑,充分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力量对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功能体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性反作用原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等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属性的几个要素中,党的领导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能动性要素,贯穿其他几个基本要素的所有功能环节和历史发展始终,彰显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②“在结构意义上,党中央是党的组织体系的战略枢纽,是党的领导系统工程的结构中轴;在功能意义上,党中央是全党的‘大脑’,负责确定党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部署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任务,并组织总体实施”。^③从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来看,党是各项事业的决策核心和指挥中枢。“我国社

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④历史充分证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谋求独立解放的艰辛探索中有了“主心骨”,在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有了“中流砥柱”,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征途有了“领导核心”,在追赶现代化的世界浪潮中有了“时代先锋”。^⑤

基于唯物史观视角,无论是从政治上层建筑出发,还是进一步深入国家的国体与政体组织当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在中国的国家存在和力量体系中所体现的主导性因素和根本性特征。“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话语创新,本身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即政治意识,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

四、方法论精髓:对给定性与选择性辩证统一的吸取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中都指出,方法不是外在于理论体系内容的路标,而是内容的有机形式,体系不过是方法在内容中的贯穿。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⑥可见,理论是由基本原理、方法论和具体结论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一种哲学形态,唯物史观是一种理论与方法互为一体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方法论也是一种具有理论内容的方法论,没有具体理论内容、脱离于历史性与实践性的方法论,理论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会变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把理论理解为一种方法论,是理论获得持久生命力,更好发挥理论对实践指导作用的方法论自觉。

(一)坚持客体受动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走历史必由之路,主体性的发挥当以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为限”,这是唯物史观的精髓与实质。^⑧客体受动性与主体能动性作为唯物史观的本源性方法论,这是由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奠定的新唯物主义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哲学革命正是源于对“一切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的双重变革,创立了从“感性的人的活动”,从“实践”和“主体”维度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的新唯物主义,^⑨开启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生成之旅,堪称是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为最终创立唯物史观奠基了哲学基石。^⑩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社会历史科学,其方法论精髓根本地表现为给定性与选择性的辩证统一,为人们廓清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引。“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要命题,是一个充分反映唯物史观本质规定性与方法论精髓—客体受动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性命题,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哲学精髓的把握与运用。

从“客体受动性”维度来看,这一命题既指中国国情是党的领导的现实规定性,强调党的领导的历史前提性与现实必然性,也指党的领导形塑了中国的现实规定性,即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民族复兴使命,需要从党的领导这一最大现实国情出发。从“主体能动性”维度来看,命题指的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前提和遵循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和政党的能动性,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汇聚主体力量,彰显相对于客观受动性的主体能动性,蕴涵和体现的是唯物史观关于尊重历史客体给定性前提下发挥历史中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哲学意蕴。从“客体受动性”与“主体能动性”辩证关系维度来看。如果说国情是党的领

导的给定性规定,那么党的领导则构成了国情的能动性规定。一方面,国情是政党执政的现实规定性,是党的领导的实践起点,对国情的判断,关乎政党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和原则问题;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不受制于国情的现实被动规定,恰恰是为了改变国情现状,朝着政党主体标定的方向发展,表现了政党主导性。

(二)坚持自然历史过程与自觉实践过程的辩证统一

由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所在”,这种“内在精神的区别又必然体现为制度与执政党性质的区别”。^⑪从社会性质和制度属性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动性”的重要规定性。通过发挥“党的领导”即“主体能动性”让一般历史规律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唯物史观关于“自然历史过程”与“自觉实践过程”辩证统一的实践遵循。这一唯物史观方法论自觉所折射出的历史性内涵表现为:国情的历史性与发展性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生成与发挥内在相通、互为一体。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的客观存在,才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社会主义历史奇迹留下了发挥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空间,生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之路。在科学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致力于改变世界,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哲学气质,涵养了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追求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实践品格。作为一个使命型政党,党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立足“人口规模巨大”实际,领导创造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⑫赋予“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命题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对国情的认识绝非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直观、机械、僵化的认识与反映,而是一个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对客观存在的科学判断,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对现

实的能动性改造和实践的自觉创造性过程。所以,国情与党的领导相互规定、相互表征、相互同构,彼此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是“一种在生成的整体之中的对立统一、差异而和解的合成”,^⑩形成合理限度的张力结构,也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辩证觉解。“自然历史过程”体现的是社会存在、生产力、经济基础对社会意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前提性遵循过程。“自觉实践过程”体现的是社会意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经济基础的能动性创造过程。“自然”与“自觉”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是一对辩证关系。只看到和夸大历史发展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维度,就会把唯物史观解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唯物论,随之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能动性发挥及其所创造的历史成就也就被“历史必然性”所消解。反之,如果只看到和片面强调社会意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性维度,也会把唯物史观解释为一种脱离历史与实践前提的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同样随之而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能动性及其所创造的历史成就也就会被“历史偶然性”所消解。被撕裂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历史张力就会突破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哲学道路,从根本上动摇和解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哲学根据——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过程,就是在既反对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又批判和摒弃“政治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实现的,由此哲学智慧与方法论自觉的推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道路,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构筑了坚实的哲学基石和深厚的历史支撑。

五、结语

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应对时代挑战、破解时代难题、指引民族复兴提供了行动指南,指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中国的“改变”,也实现了对中国国情

的重塑。就中国国情系统中的根本方面——“社会性质”而言,^⑪近代以来总体上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与阶段性跃升,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呈现从质变再到阶段性质变的发展进程。党的十八大之后,由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又实现了新的阶段性质变与飞跃。进入新时代,十年变革成就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也使唯物史观更加具象化。回顾百余年中国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的多次转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其作用发挥具有关键性和前提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实践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百年成功是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伟大胜利”。^⑫“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⑬“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创性命题与标识性话语,正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时代,对党的百余年历史与现实运动的真切话语表达。党的百余年历史,既是党的领导生成与发挥的历程,也是中国国情不断得以重塑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国情特别是社会性质演变具有的深刻互动性,造就了一个“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有机统一生命体和命运共同体,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了一个“政党—人民—民族”的有机统一生命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原创性命题与标识性话语,既蕴涵“以中国为方法”的方法论,^⑭又蕴涵“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的方法论,不仅是一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国情观的话语表达,也是一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自身“是什么、要干什么”的自我追问与话语表达,具有产生“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和“以中国为方法”互动共生的理论效应与话语特质。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国情观,无论是从中国看世界,还是从世界看中国,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视角和主线,离不开对党的领导这一

最大国情的前提性审视。离开中国共产党“政党元素”的视角分析,就会脱离中国“最大国情”和“最大特色”,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就会依附于外来文化与思想,落入“学徒状态”漩涡之中、亦步亦趋,丧失主体性而缺乏“自我主张”、^①迷失自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政党观,无论是同人口要素和“物质生产方式”前提性国情要素,还是同社会性质、历史方位、发展阶段、主要矛盾和文化遗产等基本国情相比,党的领导作为国情系统中的最大变量和关键因素发挥着基础性和能动性作用。凸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的前提性与关键性地位,对于提升中国特色自主话语体系创新的唯物史观自觉,打造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强化对党的领导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论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范畴构建的中国特色自主话语体系,绝不是孤立于世界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自我表达,必然呈现民族性与世界性、原则性与兼容性辩证统一的话语张力与叙事风格。

“站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时空交汇点,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定性为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特色和最本质特征,这是对任何怀疑、动摇、削弱或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的言论的发声亮剑和理论回应,不仅从根本上廓清了一些人思想上存在的认识迷雾,也为当代‘中国号’巨轮的行稳致远点亮了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②追问“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重要命题“是其所是”的历史原相与本源性根据,避免“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③赋予其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内涵,能够更好实现对党的领导与中国国情本质关系言说方式中潜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传统本体论思维倾向的超越,彰显中国共产党元问题研究的唯物史观视域。立足民族复兴战略布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破解“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提升对“唯物史观—中国共产党—中国”有机统一生命体的当代证明,

促进“以中国为方法”和“以世界为目的”的辩证统一,促进“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和“以中国为方法”的视阈融合,促进“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的”和“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价值融通,让唯物史观闪烁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释放出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

注释:

①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0页。

②李庆英:《认清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兼谈中国共产党人国情观的最新发展》,《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9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④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第12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⑥习近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4年第7期。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⑨苟娇、韩秋红:《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左翼视域下政党思想理论的探析与反思——以卢卡奇与激进左翼为例》,《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7期。

⑩陈加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历史逻辑与方法论自觉》,《四川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⑪刘同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依据:生产方式的创新性发展》,《北京大学学报》2023年第1期。

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⑭王香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最大国情、最本质特征》,《红旗文稿》2016年第23期。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⑯《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页。

⑰龚少情、齐卫平:《使命自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征》,《学术探索》2017年第11期。

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7—568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379页。

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55页。

⑰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134页。

⑱陈曙光:《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生存逻辑——理解“两个结合”的另一个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⑲《中国共产党章程》,第1页。

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34页。

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3页。

㉒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㉓韩庆祥:《论马克思哲学的生成性本质》,《学术界》2019年第2期。

㉔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㉕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㉖陶德麟、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㉗《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7页。

㉘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2页。

㉙王可卿:《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百年历程、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湖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页。

㉛李庆英:《认清和把握新时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兼谈中国共产党人国情观的最新发展》,《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第9期。

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㉝杨筱刚:《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㉟鲁品越:《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方法论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哲学意蕴》,《哲学研究》2022年第2期。

㊱杨筱刚:《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第541、546页。

㊲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2-23页。

㊳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3页。

㊴毛泽东早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阐明了中国国情的基本内涵:“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㊵王伟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8期。

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45页。

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继承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思想基础上,于1989年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或“方法论化中国”理念与主张,并发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旨在学术话语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上重新构建一个认识中国的框架,在当时中国学术话语中影响极大。在吸收学术界对这一理念与方法研究传统的阐扬与运用背景中,借此理念与方法并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提出“以中国为方法”和“以中国共产党为方法”的视域融合,对于当下中国特色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参考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许纪霖:《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张城:《中国道路的方法论——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开放时代》2021年第2期;朱捷:《重审“作为方法的中国”》,《读书》2022年第10期;沈湘平:《“作为方法的中国”的深层独特性》,《北京日报》2024年8月26日,第11版。

㊸吴晓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

㊹王香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最本质特征》,《红旗文稿》2016年第23期。

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作者简介】陈加飞,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成都),2024.5.15~24